

坚守家国情怀、学术理想与自主创新

——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史论

何明

“魁阁精神”引领下的学术坚守

1938年3月，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在武汉开会期间，从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处得知“吴文藻亦可南来工作”，随后便极力邀请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教，多方斡旋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资助云南大学增设社会学讲席并由吴文藻负责课程教学。1939年，教育部批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并取得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建立“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夯实学科建设，特邀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林耀华、瞿同祖、史国衡、王康等学术专家来校任教，同时选留张之毅、田汝康、谷苞等国内高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入职工作。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吴文藻及工作站迁至昆明郊区呈贡，工作站设于魁阁星阁，“魁阁”也因此成为当时和后人对这个学术团体的称号。

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确定了“志在富民”的研究目标。他以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议题，将经济生活作为“魁阁”学者群体的调查研究主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即《云南三村》）及《西南工业的人才基础》《新工业中的艺徒》等调研成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经济生活的调查研究，如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论个旧锡业》《役政与劳工》，张之毅的《榆村经济》，谷苞的《化城村乡的经济传统》，郑安伦的《堡村商业》等。不仅如此，费孝通在美国访学期间（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将“魁阁”学者的经济生活研究编译成英文著作出版，成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窗口。

为拓展西南历史、文化和地理研究，1942年3月，经多方努力西南文化研究室得以建立，聘任方国瑜为主任，聘请本校文史、社会两系相关教师为兼职研究员。自此，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社会学派与历史学派在云南大学汇聚，并为后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田野”中孕育出的实践成果

推动“田野调查”是贯穿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夯实实践成果的一条主线。1948年春，杨恕接受云南大学聘请出任社会系主任，组织师生开展了田野调查、建立调查基地。1953年3月院系调整后，社会学系撤销，杨恕、江应樑等转入历史系，在历史系组建中国少数民族史教研室，继续推进民族调查和中国民族史的教学科研。所有调研项目均由各系主任亲自参与，真正体现了扎根

20世纪40年代，由吴文藻、费孝通等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创建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开展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调查与研究，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悠久的学科历史、优秀的学术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创造了难以替代的发展条件。

田野、家国情怀、学术理论与自主创新的学科精神。同期招收了中国民族史副博士研究生和本科学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彝族史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傣族史》等系列研究成果。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李有义深入路南多民族聚居区调查，于1943年撰写出《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用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相互补充的生动事实。随后由方国瑜带领青年教师参与国家重大工程《中国历史地图集》研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绘制出各个历史时期云南的历史地图及其与周边国家的边界。改革开放以后，陈庆德带领经济民族学团队扎根“山野”，开展了一系列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调查研究，完成了《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发展人类学》《民族文化资本论》《经济民族学》等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经济民族学理论体系。

从1999年末至2000年初，云南大学整合全校各学科力量，对境内25个少数民族进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参与师生达130多人，完成《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003年联合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调查”，完成了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55个少数民族调查，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从“书斋”向“田野”的转变。

从2003年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在云南红河、丽江、大理、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农村建立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田野调查被确立为民族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以及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必备的理论和实践训练环节。

传承“学术报国”的发展研究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破解边疆危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当

务之急。为推进学术成果在边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创立者吴文藻呼吁建设“边政学”，开展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与加强边疆治理，并撰写《边政学发凡》一文，建构起“边政学”学科框架。杨恕担任社会系系主任期间，确定了重视边疆社会研究的方针，强化了边疆地区调查研究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方铁等致力于边疆治理历史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随后建立边疆学研究所，开展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的调查研究，出版了《边疆学研究丛书》。由田汝康亲自赴中缅边境地区芒市傣族村寨调查撰写出的《芒市边民的摆》，成为社会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从2009年开始，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积极开拓东南亚新领域，推出《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多部，以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探讨中国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与建构、社会文化的国家建构等前沿性议题。

1996年，国家启动“211工程”建设，云南大学民族学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先后获准民族学硕士和二级学科博士、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设立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实施“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设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设影视人类学研究课程进修班；组织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调查”“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基地建设”等大型项目；建成人类学博物馆和影像人类学研究中心，跻身全国民族学学科先进行列。

以“从实求知”为架桥的学科建设路径

云南大学民族学从创建起，就以“从实求知”为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知识生产的基本路径，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吴文藻提出“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

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的社会学中国化思路，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范式。费孝通把这一知识生产的路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创办初期，瞿同祖开设了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的课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同时期，胡庆钧以呈贡的基层政权作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张晓辉等推进民族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出版了《中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中国民族法学》等系列成果，成为中国民族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重镇。上世纪40年代初，许烺光在滇西调查时遇到霍乱爆发，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及时展开调查，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撰写出著作《驱逐捣蛋者》部分内容，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和民族医学最早研究者之一。21世纪前后，云南大学民族学学者致力于推动民族医学、民族生态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和调查研究，出版了《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丛书》《艺术人类学丛书》等系列成果，其中多部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学学科恢复重建，1978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获得国家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获准设立人类本科专业并于次年招生，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积极开拓包括南亚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志调查研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等系列重大课题，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内容，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合作，承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发起“东亚人类学论坛”和“东亚山岳文化研究会”等国际学术组织，云南大学民族学在发展中不断强化社会责任，创新学科建设。一批批学子名流积累下的学术经典、研究成果奠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

2017年云南大学民族学被评为A+学科并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逐步建成“课堂+田野+语言+技术+艺术”的“五维育人”模式，本科专业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云大人对家国情怀、学术理想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镌刻着民族学师生不畏艰险、追本溯源开展田野调查的深深足迹，留存有无数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指引意义的璀璨研究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

——读《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有感

李树泉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由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编著的《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书籍共39章，收入140多篇回忆文章，总计70余万字，记述了从1926年11月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到1950年2月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成立、云南省委组织部建立，再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云南组织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的过程，该书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从亲历者的角度，回顾了云南组织工作近百年艰苦卓绝、勇毅前行的奋斗历程，为推动党史工作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素材。

如果说党的文献是记载党的历史的骨架，那么党的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回忆资料，无疑就是血肉，正是由于他们的记述才使党的历史更加丰满、生动。早在1937年5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红军长征胜利不久，就由毛泽东、朱德署名，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发动各革命根据地对相关文件材料进行广泛的征集工作，并发动老红军、老干部撰写回忆录。1949年，中央军委又发出征集革命历史文件资料的《通令》，要求各野战军在战斗和胜利进军空隙，收集革命历史文件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多次号召并积极组织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的出版，无疑是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本书编者从浩繁的史料中耙梳有关云南党组织的回忆文章，采访健在老同志，反复比较核对，记录下鲜活、生动的组织史资料，这些资料较为完整系统地记载了云南组织工作百年发展历程，弥补了云南组织史料的空白，为研究云南组织发展和云南党的历史提供了支撑。

红星照高原 云岭有先锋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读后感

朱鸿召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境内最高山脉为云岭，最高山峰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矗立其中。卡瓦格博，藏语意为长寿和智者的尊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新世纪以来，中共云南省委以“云岭先锋”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品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扎根高原红土地，续写为边疆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丽史诗。《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的出版为了解、学习、研究云南党的组织工作历史历程提供了丰富、生动、翔实的珍贵史料，对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由70余万字的上下册书籍及38集访谈专题片组成，于2023年3月研究编纂、拍摄制作完成，客观真实还原了自1926年云南第一个党组织建立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云南组织工作的历史脉络。

《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中记录了这样的内容：1926年11月7日，昆明平政街节孝巷24号（今55号）民宅里，四位进步青年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召开云南第一次党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会议决定吴澄担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为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还决定把周霄、黄丽生两家作为特支日常工作机关。这一天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日，标志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云南诞生了。从此，共产主义理想的星光升起照耀在云贵高原，指引着边疆各族儿女为实现美好理想不懈奋斗的方向。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者，走出云南，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然后回到家乡，为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择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年轻的生命，表达着对于

党的历史承载着党的一切活动，是党一路走来的真实体现，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事业需要不断接续奋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真实生动的口述史料，无疑为我們的党史宣传教育提供了更多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借由原始、鲜活、生动、准确的党史资料，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亲历者们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伟大实践，作为参与者、见证人，他们的回忆录、口述不仅能为编写党的历史和进行党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更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的绝佳素材。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最好的清醒剂。《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中记述了云南省委首任组织部部长刘平楷，对党忠贞不渝，被捕入狱后把监狱当战场，临终前在给妻子的信中发出“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而死，我心甘情愿”的铮铮誓言，展现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组织工作者为党的事业甘洒热血、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品读《云南组织工作口述史》，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对党的历史伟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云南选才育才育才史话

缪云台：广纳英才振锡业

聂然文 耿嘉/图

缪云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云南近代闻名遐迩的实业家，对云南个旧锡业的振兴、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缪云台在个旧锡务公司任职期间，广纳英才，聘请专家改造设备，扭转了锡务公司生产技术落后、连年亏损的局面，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云锡”品牌得以驰誉世界。

艰难摸索的个旧锡务公司

长期以来，锡业在云南地方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晚清以来，云南地方政府和主政者一直较为关注个旧锡矿的开发，先后成立、改组公司，控制重要的矿洞“广尖”（采矿和选矿的场所），收购私人厂尖炉冶炼的锡矿，不断改进生产方式，这一变革过程异常艰难，遭遇了很多困难和阻碍。其间，官办锡业在推进机械化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抵制英、法隆兴公司对个旧矿产的掠夺，个旧厅的厅丞雷元澍、个旧士绅李文山筹集资本，筹办个旧厂官商公司。清宣统元年（1909年），云贵总督改组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设立个旧锡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个旧锡务公司）。公司虽然建立起来了，生产却遇到诸多问题。以选矿厂为例，传统土法选矿的工艺发展成熟，但生产效率低，为提高竞争力，个旧选矿厂计划通过引进机械设备提高选矿效率。派遣专人到南洋产锡地考察后，个旧锡务公司聘请了英国工程师司奈克和华特、德国工程师斐劳禄，并向德国礼和洋行购买了选矿等机械设备。1913年春，随着洗砂、炼锡及索道等设备先后安装完毕，公司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但由于早期选厂矿料不足，水源和动力不稳定，并不断遭到行业守旧派的抵制，个旧锡务公司经营惨淡，亏损严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价上涨，锡务公司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既请“洋先生”，又拜“土师傅”

留学美国、主修矿冶的缪云台于1920年回国后便致力于报效家乡。他提出了针对企业存在问题的《整顿个旧锡务意见书》，以期改善当时债台高筑的个旧锡务公司。彼时的缪云台虽然年轻，却怀抱一个信念：我们既有矿藏，便未入绝境，唯一的问题只是如何与别人竞争，采炼矿石运销于市场而已。1920年12月1日，缪云台被委任为锡务公司总经理。

就任后缪云台首要的工作是设法还清旧债，然后全力提高生产效率。除了裁汰冗员、减少浪费，更重要的是改革技术，恢复原有的新式设备。此间缪云台雇佣本地工业学校的毕业生下矿工作、鉴定标本，以锻炼储备人才，为后期采用新法做准备。同时，采取提高奖励来激励工人自觉提高技术标准。缪云台从不因自己是留美的大学生而自傲，相反，他经常深入矿场查看工作进度，下班后与工人饮酒谈天，借此向工人了解实际情况，并学习“土法”采矿的经验。

在借鉴“土法”培养当地人才的基础上，缪云台还设法聘用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专家。他认为自己的所学仅限于坑道的修筑使用，对冲洗冶炼等技术并不熟知，在炼锡领域更是缺乏实践经验。他首先雇佣了外国工程师撒拉和欧负责设计开凿馬拉格竖井，搬迁蓝蛇洞索道。同时特意安排了几名云南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外国工程师手下协作工作。一番操作下，原来废弃的空运索



缪云台塑像

道、洗砂厂、炼砂厂陆续恢复使用。任职两年间，缪云台通过培养人才，使先进的设备和工艺真正应用到生产中，大大降低了成本。

巧聘英国专家改革冶炼

1930年，时任云南省农矿厅厅长的缪云台仍然记挂着个旧的锡业。基于之前在个旧锡务公司任职的经历，缪云台提出了个旧锡业的发展方向：提高冶炼技术，直接外销，摆脱中间商人转手的剥削。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很多，为此缪云台从资源和方向上不断助力，为个旧锡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缪云台多次邀请外国专家前来指导。由于多种原因，改革冶炼技术的尝试都没有较大突破。通过深入分析，缪云台决定聘请英国专家前来指导，但英商对相关技术经验十分保密，聘请计划遇到了阻碍。随后缪云台向英国领事提出，云南有意扩大对英国